

臺灣公共建築與城市近代化

文·圖片提供／黃士娟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所副教授）



▲ 1899年臺中市區計畫圖（藍色計畫道路日後並未實現），出自黃武達編《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（第二冊）》，2006年，南天書局、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出版。（紅格子線及藍線為筆者加註）

臺灣自1684年納入清朝版圖，最初只設臺灣府城（今臺南市），1723年創建時為木柵城，1736年將七個城門改建為石造；其次為淡水廳城（今新竹市），1732年創建時為荊竹城，現存城門為1826年改建；1871年牡丹社事件，琉球人被殺，為加強臺灣南部防務，於1875年興建恆春城（今恆春市），1884年臺灣最後一座城臺北城竣工。

1895年清朝政府因《馬關條約》割讓臺灣予日本，臺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，直至1945年為止。日本政府於領臺之初，面臨最大的阻礙不是臺灣住民的反抗，而是因衛生引起的流行傳染病，根據1895年接收臺灣時的報導，因疾病死亡的人數遠遠高於戰死者。

隔年總督府延聘日本內務省衛生

局長後藤新平擔任衛生顧問囑託一職，在後藤新平的推薦下，臺灣總督府聘任當時工科大學衛生工學教授爸爾登（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）為「衛生工程顧問技師」囑託，以實地進行臺灣地區上下水道等衛生工程所需的設計與計畫等建議。爸爾登不僅是工科大學教授，同時協助日本多處進行上下水道的設計，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。受到爸爾登影響最多的是臺中市的市區計畫，臺中市如何從原本的軍事城市轉變成為現代化都市？

清朝重要城市大多具有風水考量，而在傳統風水的環境下，如何透過市區改正、市區計畫到都市計畫轉型為現代都市？最能清楚呈現各階段之特徵的是日治時期臺灣首府臺北市。以下以臺中市、臺北市作為案例進行介紹。

臺中市：從軍事城市到衛生城市

1887年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因臺中位處於臺灣中部南北相會之處，軍事上



▲臺中州廳。（圖片來源：《臺灣之展望》，1932年）

非常重要，奏請於臺中開設省城。日治之後，臺中縣知事兒玉利國亦認為臺中於軍事上非常重要，希望將臺中建設為一軍事城市，依羅馬早期都市規畫設計提出圓形市街觀念，並將公園、官廳放在城市中央。這樣的規畫，利於統治者於發生事情時，可以很快的抵達城市各個角落。

1896年爸爾登受聘抵臺，和助手濱野彌四郎進行臺中市街調查，於同年年底提出〈臺中市街區畫設計報告書〉及〈臺中市市區新設〉兩篇詳細的報告書，就衛生工程以至於市區計畫之設計，建立一套由衛生基礎調查到市街區畫設計的完整設計體系。爸爾登認為兒玉所提的古羅馬圓形軍事城市，配置家屋、水道工程建設上都不方便，建議採用歐洲各國較為普遍的棋盤式市街設計。但是純粹的棋盤式設計又有路徑過長的缺點，因此設置對角線補強交通系統，確立了臺中市的格狀都市形態。

來自溫帶的爸爾登將市區計畫的棋盤狀道路系統旋轉55度，希望透過充分日照達到衛生消毒，使臺中市街區之建築終日可獲得充分的太陽照射，此舉日後卻讓臺中市民飽受太陽直射造成的炙熱之苦。

爸爾登的都市計畫中並未強調公共建築和都市軸線間的關係，因鐵道位於兩個市區中間，將主要公共建築配置於聯絡鐵道兩側的主要道路上，而臺中廳所在街廓即為原清朝官廳建築所在，都市休閒設施如公園、俱樂部等則設於

鄰接郊區的街廓中。臺中州廳設計者森山松之助於既有街廓設計公共建築時，將入口設於轉角處，以增加威嚴性，這樣的手法於其他許多地方均可見，如臺北、臺南州廳。

臺北市：從風水到都市計畫

1860年淡水開港之後，北部貿易開始發達，臺灣經濟重心由南向北移；1875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議設臺灣府於艋舺地區，稱為臺北府，以兩市街中間的水田作為興建基地，開始植竹改善土質。前後任主政者福建巡撫岑毓英、臺灣道劉璈，對於風水的看法不同。岑毓英將臺北城對向恆常不動的北極星，形成方形城池，其任期間完成部分公共建築及主要街道；劉璈之風水觀為巒頭派，以山勢的走向為建城參考，故而更改城牆的方向，將原本正北之方向改為偏東，以遙對臺北盆地內最高峰七星山，使城牆有祖山可以倚靠。因前後主事者的風水觀不同，導致臺北城牆和街道之間形成一個角度，1884年臺北城終於竣工。

日治之後，對於才剛完工十一年的臺北城牆之存廢引起討論。主張拆除的認為為了都市發展，大稻埕、城內、艋



▲臺灣近代城市規畫源自清朝時期。圖為北門及其周邊。

艋三區遲早會結合，不拆除無法成為大都市；主張保存的認為城內衛生狀況較佳，艋舺與大稻埕人口雜居，城牆可以做一隔絕，由1900年公布的「臺北城內市區計畫圖」，可以看出當時增設城門以改善交通問題，各機關也向臺灣總督府申請拆除一段城牆作為建設使用。

1901年為配合奉祀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臺灣神社落成，拆除東門以北城牆作為勅使道路（今中山北路），依當時兒玉源太郎總督之意見，留下東門作為紀念。之後，除了早已拆除之西門之外，其他城門並未隨著城牆被拆除，反而因東門之例而被留下來，日後更成為史蹟、國定古蹟，成為見證歷史的都市景觀。

日治之後陸續發布臺北市市區改正計畫，其中1905年發布的都市計畫圖影響最鉅，於原城牆位置規畫為三線道路。這次的都市計畫之道路以棋盤化為目標，讓城內外的交通順暢，在新的道路計畫中清朝廳舍面臨拆除命運，等於



▲臺北市兩條主要都市軸線。（圖片來源：《古蹟探密 解碼臺灣》，2011年，國立臺灣博物館出版）

◀ 1895-1905年間臺北道路示意圖。（圖片來源：《古蹟探密 解碼臺灣》，2011年，國立臺灣博物館出版）

以都市計畫之名清除前朝記憶，同時塑造新時代的空間記憶。

於此次都市計畫中，延續重要公共建築、公共設施多配置於城牆都市開發較少區域之原則，例如臺灣總督府、新公園。日治以來臺灣總督府沿用清朝廳舍建築，有必要興建足以讓臺灣人民心服口服的建築。1907年公布總督府廳舍競圖，由競圖資料可以看到總督府基地周邊已有總督官邸、民政長官官邸、臺灣銀行、彩票局、臺北醫院等官方建築，總督府基地是城內少數街廓完整且大面積的空地，地上物僅有民間的陳氏宗祠，只要遷移宗祠就可形成新的政治中心。

經過兩階段競圖，1909年公布結果，第一名從缺，第二名為長野宇平治，因此由落選的總督府技師森山松之助進行實施設計。外觀方面，森山擬了中央加塔樓、圓頂兩個方案，最後經東京方面的審查委員決定，1919年完工，成為

臺北盆地內最醒目、最高的建築。近代以前，歐洲城市最高建築通常為教堂，日本城市中最高建築通常為佛寺；近代以後，殖民地臺灣最高建築為總督府，成為都市天際線中最重要的塔樓，以其為中心，周遭官廳建築群成為統治臺灣的政治中心。



▲表町及臺灣博物館。（圖片來源：《臺灣之展望》，1932年）

臺灣總督府於1919年完工後，臺北市形成兩個重要都市軸線：第一條為臺北車站和兒玉後藤紀念博物館（今國立臺灣博物館），每個搭火車抵達臺北的人，最先看到的是紀念兒玉源太郎總督和後藤新平民政長官的博物館，而臺北車站前之表町則是經過改造、代表新時代的街屋。第二條為赤十字社、東門、臺灣總督府，赤十字社之名譽總裁為日本皇后，隔著清朝的東門兩相遙望，軸線標示出這兩條是臺北市最為重要的道路。至此，臺北市的軸線由清朝的風水轉為紀念統治者，空間和權力之關係不言而喻。

結論

臺灣近代城市規畫，自清朝時期因應防禦而產生的傳統城牆都市，日治之後有兩個重要都市規畫方向，一是為了便利敷設上下水道，以棋盤狀道路系統套於既有城牆都市中，如臺中初期的都市計畫；另一是為了強化統治

的威嚴性，設立由公共建築和道路所形成的都市軸線，如臺北市、新竹市、臺南市，強化官廳建築於都市生活中的重要性，讓市民於每天都市生活中可以很清楚感受到空間權力。

透過都市空間改造、興建新式公共建築，讓人民深刻感受到時代的轉變，這樣的手法於明治初期的地方城市曾經被應用過。例如山形縣山形市，為了建立新首都，外務大臣井上馨特地邀請德國建築師安德、布克曼於1886年為東京提出官廳集中計畫，於既有的新橋車站和皇居間新設中央車站，以中央車站往北，設立由天皇大道、皇后大道所圍塑之三角形都市廣場；而天皇大道和皇后大道於道路末端合而為一成日本大道，天皇大道旁則設置東京府廳、裁判所、警視廳等官廳。官廳集中計畫於隔年隨著井上馨失勢並未實現，但讓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當臺灣成為新的殖民地時，臺灣的都市計畫成了統治者實驗的新天地，除了初期以衛生為主，之後的都市計畫大都思考公共建築和都市間的關係。公共建築如同於都市中的一顆棋子，該將哪顆棋子安置於何處，除了滿足建築機能外，透過空間展現統治者對於城市之支配權力，更為重要！



▲ 1919年臺南市區改正計畫圖。臺南車站新設筆直計畫道路銜接圓環，圓環邊黃色區塊為臺南州廳預定地，車站和新州廳連成一個新的都市軸線。圖片出處：總督府公文類纂。（紅色圓圈為筆者加註）